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长期课题

黄霖 主编



ZHONGGUO FENTI WENXUE XUESHI

中国分体文学学史

◆ 散文学卷 下

罗书华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黄霖 主编

中国分体文学学史

ZHONGGUO FENTI WENXUE XUESHI

◆ 散文学卷 下

罗书华 著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长期课题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第九章

吕祖谦：从文道到意法

【内容提要】吕祖谦的《古文关键》不仅是散文评点的先行者与典范，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在选文中确立了古文的标准，在评点中实现了由道向意、由文到法的转移，使散文文学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使得散文文学史开始实现由道向技、由本体论向创作论、由空廓玄简向具体实在的重要转变，从而将散文文学史带入了一个新纪元。不过，《古文关键》并非只是揭示文章“关键”的纯粹技法之书。“古文关键”的“关键”也不单是指文章结构方面的起承转合，它有四个层次的含义：唐宋八家议论文是古文发展的“关键”，“意”或“立意”是文章创作的关键，体法、篇法、句法方面的“变化”是文法的“关键”，“有力”是古文审美的“关键”。

在吕祖谦《古文关键》之后，南宋后期陆续出现了多种性质相近的古文选评本，其中，楼昉的《崇古文诀》、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与谢枋得的《文章轨范》最具代表性。《古文关键》和《崇古文诀》、《文章正宗》、《文章轨范》可谓中国散文评点的“一祖三宗”。三宗继一祖而起，各有继承和发展。《崇古文诀》以文法为中心，是文章家的评点；《文章正宗》以义理为中心，是理学家的评点；《文章轨范》则文法与义理并重，是传统文士的评点，它们三足鼎立，代表了古文评点的基本结构和发展方向。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历太学博士、著作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南宋理学家和史学家,世称东莱先生,与朱熹、张栻合称为“东南三贤”。以创办丽泽书院和创立“婺学”著名,全祖望论南宋学术时说:“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又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①同时,吕祖谦也是当时的文章名家。《宋史》称他的文章“特典美”,元人吴子良说“东莱早年文章在词科中最号杰然者”^②。四库馆臣也说他“文词闳肆辨博,凌厉无前”^③。编选过《古文关键》、《皇朝文鉴》(即《宋文鉴》)、《东莱集注观澜文》等多种选本。其中《古文关键》一书,在散文文学史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古文关键》一书,《宋史·艺文志》载录“二十卷”,《直斋书录解题》载录为“二卷”,四库馆臣根据“《书录解题》所载,亦只二卷,与今本卷数相合”,判断“知全书实止于此。宋志荒谬,误增一‘十’字也”。现在的通行本有《丛书集成初编》本和《四库全书》本两种。另外,还有中山大学馆藏明初刻本,与日本官板本等版本存世。这些版本都是上下二卷。另有蔡文子增注本二十卷,《宋史》所说二十卷,可能指的是这个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本书的编选者,还有一些异说。丛书本附徐树屏本跋语说:“余家旧藏《古文关键》一册,乃前贤所集古今文字之可为人法者,东莱先生批注详明。”近于说吕祖谦不是本书的编选者,而只是评选者。日本官板《古文关键》目录下的题署作“东莱吕祖谦伯恭评”,也与这种说法相呼应。而通行本文献中也存在一些矛盾参差的地方,如“卷首所载看诸家文法,凡王安石、苏辙、李廌、秦观、晁补

① 全祖望《同谷三先生书院记》。《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46页。

② 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3《词科习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81册),第506页。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159《东莱集》,中华书局,1965年,第1370页。

之，诸人俱在论列，而其文无一篇录入”^①。与此相反，卷中收有苏洵文章，但卷首论述文字却不及苏洵。当然，单凭这几点还不足以推翻吕祖谦的编选批评权。前引跋语中所说“前贤”虽然与“东莱先生”对提，但说法也很含糊，并没有明确将东莱先生排除在外。与此相似，“东莱吕祖谦伯恭评”，也可以隐含吕祖谦编选的意思。编选与批评中无法完全落实当初设想的情况，在文学实践中也可以说比比皆是，也就是说，卷首所论与后面所选的参差，“总论”所提体式名目在下卷中的落空，确实可知《古文关键》的版本情况比较复杂，但是它们加在一起仍不足以否定吕祖谦的著作权。

第一节 标准的树立

选本无疑是中国文学、文学思想的主要载体之一。就现存文献来看，选本历史至少可以溯源到萧统的《文选》。在此之后，各种诗文合选本以及诗歌选本陆续出现，徐陵《玉台新咏》、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赵崇祚《花间集》、姚炫《唐文粹》等，都是一时名选，不过，在吕祖谦之前，选本要么是诗文合选本，要么是诗歌选本，很少见像《古文关键》这样纯粹的散文选本。

《古文关键》的选录，与文章教学和科举考试有密切关系。《直斋书录解題》卷十五载《古文关键》二卷，“吕祖谦所取韩、柳、欧、苏、曾诸家文标抹注释，以教初学”^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该书“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故谓之关键”^③。张云章也说：“观其标、抹、评、释，亦偶以是教学者，乃举一反三之意。且后卷论策为多，又取便于科举，原非有意采辑成书以传久远也。”^④《古文关键》既为科举考试而选，当时它的主要价值自然体现在科举考试领域。不过，站在现在的立场上来看，它这方面的实用价值早已被时间的长河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187《古文关键》，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8页。

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15《古文关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1页。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187《古文关键》，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8页。

④张云章《古文关键序》。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133—134页。

冲刷得干净，而原先被遮蔽的散文学价值倒是慢慢地呈现出来。（朱熹曾写信给张栻，抱怨吕祖谦：“渠又为留意科举文学之久，出入苏氏父子，波澜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坏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苏学为非，左遮右拦，阳挤阴助，此尤使人不满意。”^①）

本书绪论曾指出，现在所称的“散文”，在“文笔”对称阶段一度归属于“笔”，在“诗文”对称阶段，则干脆叫做“文”，而“古文”则是古代散文的正宗。不过，就是在“古文”的倡导者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心目中，“古文”也仍然是与“时文”相对的，与时代相关联的概念，在许多场合甚至是特指先秦两汉文章。刘勰论文体，讲究“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②，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古文”一词都是随机出现在人们的论说当中。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它还不太确定。吕祖谦虽然没有对“古文”这个概念原始表末、释名章义、敷理举统，但他无疑是在“选文以定篇”，是想通过选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认识。用“古文”作为作品选集的名称，也见证他是将“古文”看作一种文体，而从所选篇目全为唐宋文章来看，他的“古文”也已经基本汰去了这个词中固有的时间含义，将它提升成了超越时代的文体概念，与原来重点指称先秦两汉文章的“古文”意绪大不相同。

当然，正如前述，《古文关键》并没有泛选唐宋各家文章。唐宋两代跨越六百多年，文章家不下数千家，文章数目近万篇。《古文关键》只是从繁星闪烁的作家与浩如烟海的作品中选取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张耒共八家 62 篇（以丛书本为准）。这八家之选，与后来众所周知的“唐宋八大家”只是相差一人。而在卷首论诸家文法中，他对王安石也多有论列与肯定。据他的再传弟子王应麟引述，他在论读书之法时说“先择《史记》、《汉书》、《文选》、韩、柳、欧、曾、王、陈、张文，虽不能遍读，且择其易见、世人所爱

^① 朱熹《与张敬夫》。《朱熹集》第3册（卷31），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10页。

^② 《文心雕龙·序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35页。

者诵之”^①，也将王安石列入重要作家之列。在《与内弟曾德宽》中建议内弟“且读秦、汉、韩、柳、欧、苏、曾文字，四六且看欧、王、东坡三集”^②，更将王安石与欧、苏文并列。虽然说此前已经有“韩柳”的说法，王十朋《读苏文》说“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杂说》说“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③，又将韩、柳扩展为韩、柳、欧、苏。但吕祖谦将韩柳欧苏四家推衍为韩柳欧与三苏七家，并用文选的方式加以推广和强化，对另外一家王安石也多有肯定，显然与“唐宋八大家”更为接近，可以视为“唐宋八大家”之说的先声。他所编选的《皇朝文鉴》（即《宋文鉴》）特别推重欧苏曾王“宋六家”，全书收录300余人的诗文计2400多篇，其中宋六家占了900多篇，而所收王安石的篇目又是六家之冠，也可以佐证这点。“唐宋八大家”之说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由叶适、王应麟、吴澄、朱右、唐顺之等人发扬和推衍，最后定型于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贝琼说朱右的《六先生文衡》是“损益东莱吕氏之选”的产物^④，高步瀛认为“明、清之世，言唐、宋文者，必归宿于八家。考八家之选，始于宋吕东莱《文章关键》”^⑤，对于吕祖谦《古文关键》在“唐宋八大家”观念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一部文选，只选八家文章，反映了编选者在作家方面的个人偏好，可见吕祖谦对于八家文章的推崇，不过，无论是从选本的题名，卷首的“论作文法”，还是从全书的编排评点来看，编选者都不是以八家作为编选宗旨，“古文”与“作文”才是编选者的注目所在。唐宋八家的选择只是用来说明“古文”及“作文”的具体例子，只是编选者古文观

① 王应麟《辞学指南》卷1，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1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21页。

② 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别集》卷10，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502页。

③ 王十朋《读苏文》、《杂说》。《王十朋全集》文集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98、801页。

④ 贝琼《唐宋六家文衡序》。《清江文集》卷2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28册），第477页。

⑤ 高步瀛《唐宋文学举要》甲编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页。



念的表现。他在《总论看文字法》中说“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又说“第一看大概主张，第二看文势规模，第三看纲目关键，……第四看警策句法……”^①，特别强调“文字体式”与“用意”。“文字体式”，也就是“文势规模”、“纲目关键”、“警策句法”，“用意”则与“大概主张”基本等义。叶适曾对吕祖谦所编《皇朝文鉴》评价说：“苟其义无所考，虽甚文不录，或于事有所该，虽稍质不废。……大抵欲约一代治体归之于道，而不以区区虚文为主。”^②此论大致也适用于《古文关键》，可以作为理解“用意”与“大概主张”的辅助。这就是说，吕祖谦心目中的古文，不再是指先秦两汉的古代文章，也不是后人学习前人所作的古意盎然的文章，而是以八家为代表或标杆的文章类型或文体，既有“文字体式”又重“义”重“事”，为“道”而作的文章。“古文关键”的“关键”，一般说来是指命意、布局一类门径与诀窍，而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编选者也未尝没有以唐宋八家为古文发展的关键的意思。这样的古文观念当然不完全是吕祖谦的个人发明，而是韩、柳以来古文实践的自然发展，但吕祖谦的总结标示之功仍然不可低估。

不仅如此，吕祖谦所谓“古文”在题材类型上也有自己的侧重。众所周知，古文可以按照表达方式分为“记叙文”（“叙事文”）、“议论文”、“抒情文”、“写景状物”几类。用这种类型的眼光来打量，可以轻易发现《古文关键》选文的重心在议论文一端。全书共选各类文章62篇，而可以归为议论文的就不下40篇。有些以“书”、“序”与“传”名篇的作品，也可归为议论文，欧阳修的《送王陶序》、曾巩的《〈战国策〉目录序》都是这样。可以说，全书五分之四的篇目都是议论文。这种取向与该书的科举考试目的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宋人吴琮说：“省闱多在后两场取人。谚云：三平不如一冠。若三场皆平平，未必得；若论、策中得一冠场，万无失一。”^③四库馆臣也承认这点，说：

①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1页。

②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47《皇朝文鉴·周必大序》，中华书局，1977年，第695页。

③ 魏天应《论学绳尺》之《论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58册），第73页。

“当时每试必有一论，较诸他文应用之处为多。”^①可见议论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以科场指导为己任的《古文关键》偏重于议论文一边，以为“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②，也就可以理解。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排除他对议论文情有独钟，不能排除他是将议论视为古文的核心要素，是将议论文视为“古文”的典型文体。事实上，就是在近千年之后的现在，人们也常常以议论文作为文章正宗。追源溯流，这样的文章观念与吕祖谦将议论（文）作为古文的重心有内在关联。

第二节 评点的范市

《古文关键》是一部古文选本，但又不是单纯的选本，而是一部附有评点的散文选本。如果论者对吕祖谦的编选者身份还存在一些异议的话，那么，他的评点者身份则从来没有受到过质疑；如果说将《古文关键》定为现存第一部古文选本还存在较大风险的话，那么，“《古文关键》是现存第一部古文评点本”的观点则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事实上，吕祖谦在散文学史上的贡献，主要也来自于他的评点。

评点是一种直接在原文周边涂抹点评的批评方式，是一种批评与原文联为一体、不宜分割的特别批评文本，与那种脱离原文之外的独立评论形成鲜明对比。从理论上说，这是一种自然而便利的阅读、欣赏与批评活动，它与文学文本相始终，只要有阅读以及表达的愿望，这种批评活动就可能发生，特别是在纸质书籍以及毛笔流行以后。《三国志》卷十三注引《魏略》记载：“初，（董）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又善《左氏传》，更为作朱墨别异。”^③韩愈《秋怀诗》有“不如覩文字，丹铅事点勘”的句子^④。文中的“作朱墨别异”与“点勘”，大约与后来的评点相距不远。当然，由于文献难征，它们的实际形态究竟如何现在已经难以得知。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187《论学绳尺》，中华书局，1965年，第1702页。

②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3页。

③陈寿《三国志》卷13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82年，第420页。

④韩愈《秋怀诗》。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66页。



宋朝以后，由于图书文具事业的发展，国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评点活动自然更为广泛，而有关评点的记载也更为切实。黄庭坚说他读杜诗，“欣然会意处，笺以数语”^①。朱熹在谈到自己的读书经验时说：“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语录》观之，初用银朱画出合处；及再观，则不同矣，乃用粉笔；三观，则又用墨笔。数过之后，则全与元看时不同矣。”^②而他的弟子黄干（字勉斋）、再传弟子（黄干的弟子）何基也同样采取了标注评点的读书方法。《宋史》说何基：“凡听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③朱熹及其弟子纷纷采用这种方法，可见评点在南宋已经相当流行。

从引文中不难体会到，前述各家虽然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评点的方法，但他们评点的对象多是一般读物或经史著作，还没有怎么进入散文文学这个专门领域。况且评点在他们主要还是作为日常的读书活动（方法），而不是批评活动（方法），他们的目标主要在接受，而不在传播，在己而不在人。与他们不同，吕祖谦的《古文关键》不仅以古文为自己的专门对象，而且评点活动与话语指向的是他人而不是自己，具有更强的批评性质，更重要的是，这些评点还有版刻行世，至今还依稀可见它本来的面目。

正如前述，《古文关键》通行本有《丛书集成初编》本和《四库全书》本两种，此外还有中山大学馆藏明初刻本与日本官板本等版本存世。通行本现在只保留选文和评语，而在更早期的版本中，则不仅有评语，同时也有标抹或圈点。四库馆臣在介绍四库本时说：“此本为明嘉靖中所刊，前有郑风翔序。又别一本所刻，旁有钩抹之处，而评论则同。考陈振孙谓其‘标抹注释，以教初学’，则原本实有标抹，此本盖刊版之时，不知宋人读书于要处多以笔抹，不似今人之圈点，以为无用而删之矣。”^④丛书本底本（徐树屏本）原本也有点抹，只可惜在翻印时给滤去了。据《凡例》，该书另外还有两种宋本，“前本不施圈点，偶点

① 黄庭坚《大雅堂记》。《黄庭坚全集》第2册（正集卷16），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37页。

②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04《自论为学工夫》，中华书局，1986年，第2614页。

③ 脱脱《宋史》卷438《何基传》，中华书局，1986年，第12979页。

④ 《四库全书总目》卷187《古文关键》，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8页。

其一二用字着力处，圈则竟无之。后本稍用圈点，或一二字，或一二段之下，间有着圈者，点则连行、连句有之，要不过什之二三耳”^①。现存中大馆藏明初刻本与日本官板《古文关键》保留了关键字句边上的点抹符号，反映了它的早期面貌。至于丛书本《凡例》说到有宋本用了圈点的方式，则因为缺少实物印证，而且与四库馆臣说宋人“多以笔抹，不似今人圈点”不相一致，暂且存疑。

《古文关键》的评语包括全书总论和单篇评论两部分。单篇评论又可分为三种：一是文前评，一是文中旁评，一是文末评。这些批评大都是就“文字体式”和“用意下句”几方面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如韩愈《谏臣论》文前评说该篇“是箴规攻击体，是反题难文字之祖”^②，柳宗元《捕蛇者说》文前评说该篇为“感慨讥讽体”^③，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文前评说该篇“亦是攻击辩诘体”^④，都是就文字体式下笔。如苏轼《荀卿论》文前评说“此篇前骂后略取，纲目在‘不敢放言’。上面平说来，虽是平说，如‘有规矩’一句亦有句法”等^⑤，则是就“用意下句”而言的。需要提及的是，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吕祖谦都是有感而发，并不是将它们作为必须遵守的定式。有的篇章兼具“文字体式”与“用意下句”两方面的批评，有的则只有其中一种。有的兼具文前、文中、文末三种形式的批评，有的则只能在其中的一处看到批评。

事实上，《古文关键》的评点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个人的、随意的、欣赏的、感受的、接受的色彩，准确一点说，这是一种处在个人与他人、随意与有意、欣赏与批评、感受与分析、接受与传达之间的批评形式。点抹与评论两种形式正好与它们相对应。点抹偏向前端，评论偏向后端。相比于单独的评论来说，它们更显散乱，但是，这种有选有点有评、与原文一体的批评，无疑是一种充满活力富于民族特色的批评形式。它处在个人与他人、随意与有意、欣赏与批评、感悟与分析、接

①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凡例”第1页。

②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3页。

③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32页。

④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33页。

⑤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83页。

受与传达之间，其实也就兼具了两方面的优长，原文与批评互补，阅读与评论交济，实用与理论相参，作者评者读者三方交流回环，这是其他批评形式无法具有的特质。正因为这样，在《古文关键》之后，论者纷纷仿效，蔚为风气，一时成为中国散文学史上影响广泛的形式。楼昉的《崇古文诀》（又名《迂斋古文标注》）“大略如吕氏《关键》”^①，“因其师说，推阐加密”^②。谢枋得的《文章轨范》、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也与它们一脉相承。无论在选文篇目上，还是在评点形式、路数与旨趣上，都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割不断的联系，不难感受到《古文关键》的发轫之功。

第三节 意的确立

评点本来就是一种零散而不系统的批评形式，作为第一部散文评点本也难免草创阶段的简陋，与此相关，论者对于《古文关键》散文学价值的认识也往往停留在形式的层面，对于它在理论方面的意义则有所忽略。其实，吕祖谦并不是一个眼光只盯着科举考试的选家，他首先是一位造诣深幽、开宗立派的理学家，同时还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文章家，既有理论思维，又有写作实践，这就决定了他在评点时不会满足于自我的阅读感受与肤浅的结构解析。只要将他卷首总论与各篇的文前、文中、文末评稍作梳理，就可以发现他建立以“意”为核心的散文学体系的企图。

论者知道，自从韩、柳倡导古文之后，“道”便成了散文学的重心，“文以载道”、“道胜则文不难自至”、“文以害道”等都是散文学中的重要命题。饶有趣味的是，在理学家吕祖谦的这部《古文关键》的评点中，几乎找不到对“道”以及“文道”的论述，即便是对像韩愈《原道》这种文章的评点也是这样。这与他所选唐宋诸大家文章中随处可见的“道”论形成鲜明对比。

吕祖谦论文最重“意”。全书开篇《总论看文字法》下笔就说：

①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2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187《崇文古诀》，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9页。

“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①可见“意”（“用意”）在《古文关键》中的地位。《论作文法》中，也有“意深而不晦”、“题常则意新”、“意常则语新”、“意思新转处多则不缓”、“立意”等五个条目直接出现了“意”^②。《论文字病》中也有“意未尽”一条^③。这些都可见他对于“意”的重视。与此相应，他对具体篇章的评点，特别是文前评，也常常从“意”字出发。韩愈《获麟解》篇文前评：“字少意多，文字立节，所以甚佳。”^④韩愈《师说》篇文前评：“中间三段自有三意说起，然大概意思相承，都不失本意。”^⑤韩愈《谏臣论》篇文前评：“意胜反题格。”^⑥柳宗元《桐叶封弟辨》篇文前评：“大抵做文字须留好意思在后，令人读一段好一段。”欧阳修《朋党论》篇文前评：“大凡作文妙处，须出意外。”^⑦苏洵《春秋论》篇文前评：“别人意多则杂，惟此篇意多而不杂。”^⑧这些评论都是以“意”为中心。文中评中也常着眼于“意”，像“意胜”、“意高”、“词意俱到”、“此意尤好”、“意到语壮”、“总缴前意”、“含蓄下意”、“意有余”、“一场意结归此句”、“方入本意”、“说得意出”、“此意外生意”、“又生新意”等评语，在书中不时可以看见。虽然文中没有出现“意”为“关键”的直接论述，但从他的反复强调中仍然可以感受到，“意”正是他所谓的古文“关键”、作文“关键”之所在。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发现，《古文关键》中的“意”与先秦魏晋时期“言意之辩”中的“意”并不相同，与“文以明道”中的“道”距离就更远。言意之辩中的“意”，是泛指一切意，是一切意的总和和抽象，它与泛指的“言”对称。“文以明道”的道比“言意之辩”中的

①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看古文要法”第1页。

②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看古文要法”第3页。

③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看古文要法”第3页。

④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1页。

⑤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2页。

⑥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3页。

⑦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36页。

⑧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65页。

“意”又要宽广和抽象得多，“意”的对象是人，而“道”的对象则是包括人、社会与自然在内的整个世界，在某种思想范畴中它是惟一的，同时又无处不在。而吕祖谦在《古文关键》中强调的“意”，则是专指或定指，在它的前面，可以用“深”、“浅”、“新”、“旧”、“此”、“本”、“上”、“下”等等来修饰，在它的后面也可以用“多”、“少”等词来说明。比如曾巩《战国策目录序》篇文前评：“若他练字，好过换处。不觉其间又有深意存。”^① 曾巩《送赵宏序》篇文前评：“句虽少，意极多。”^② 显然，《古文关键》中的“意”是指某作者、某篇章、某片断、某场合中的具体思想内容，也就是他在《总论看文字法》中所强调的“大概主张”。一方面它只能是“大概”，另一方面对于一篇文章来说它又非常重要，是文章的主心骨，因此，它在书中有时候也称为“主意”、“大意”。曾巩《唐论》篇文前评“此篇大意专说太宗精神处”就是这样。

尽管《古文关键》的“意”不同于“言意”论中的“意”，不同于“文道”论中的“道”，但从《总论》将“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作为“看文字法”的重要内容，又强调“第一大概主张”，以及单篇的评论往往以“意”为重心来看，吕祖谦也将“意”作为文章的灵魂，将立意看作作文的命脉，将文章看做意的外化。在这方面仍然可以看到它与“言意”论、“文道”论有一脉相承之处。不过，由于这里的“意”毕竟是具体的，他对文章的立意本身也同样有强调。在他看来，一篇文章不仅要“见意”、“证意”、“意到”、“说得意出”，这意还必须是“好”意、“新”意、“高”意。只有这样，文章才能挺拔耸立。

综上所述，《古文关键》中的文意论更接近于文章写作论，与以前的文质、言意、文道这些本体论性质并不相同，将它们进行直接比较，或者放到文学与散文学本体论的发展线索上来论述，未必合适，但是，从“道”到“意”的兴替，从本体论向创作论的转变，仍然可见散文学发展的某种趋势。“法”的兴起也与此有紧密的关联。“意”的理论性减弱了，实践性却增强了，看起来显得粗浅，但在散文学史上仍然有

①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121页。

②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123页。

自己特有的价值，在散文的初学与普及领域尤其如此。即使到现在，“意”以及从此衍生的“主题”、“论点”等，也仍然是文章写作学中的核心概念，这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古文关键》文意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第四节 法的揭示

吕祖谦论文重意，但他的重心并不是从理论的角度来论述什么是意、意的重要性、文与意的关系，以及如何炼出新意等问题，他更关心的是意的表达，即在文意既定的情形下，如何使文章写得更好。吕祖谦曾说：“夫人之作文既工矣，必知其所以工；处事既当矣，必知其所以当；为政既善矣，必知其所以善。苟不知其所以然，则虽一时之偶中，安知他时之不失哉！”^①此语对于理解《古文关键》的编选动机有一定帮助。他的目的是从那些优秀的文章中寻找或揭示它优秀的原因所在（“所以工”）。而意的表达，文的“所以工”，也就是文法。

客观地说，自有文章写作以来，就有文法存在。人们总是按照某种程序和方法来写作。但是，按照程序和方法写作是一回事，认识、揭示和强调其方法又是一回事。大致说来，在魏晋南北朝时，论者已经发现文体有别或者体式有别，古文兴起之后，“文道”观念尤其是其中的“道”在散文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论者还没有来得及对文法予以更多关注。欧苏以后，文道重心开始向文一端偏移，文法开始露出端倪，而书院的兴起与科举考试的需要，更是对文法形成了直接刺激。另外，诗歌的成熟与诗法的感悟也是文法出现的重要契机。以“夺胎”、“换骨”法著称的黄庭坚，在《答王子飞书》中夸赞陈履常“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也。至于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其论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时辈未见其比”^②，在《答洪驹父书》中说他的外甥洪刍“寄诗语意老重……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绳墨耳。可更熟读司

^① 吕祖谦《东莱吕太史外集》卷5《杂说》，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715页。

^② 黄庭坚《答王子飞书》。《黄庭坚全集》第2册（正集卷18），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67页。



马子长、韩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①，都是诗文并论，而“关键”、“首尾”、“开阖”等概念，则是相当显明的文法观念，从中可以较为清晰地感受到诗法向文法的渗透。吕祖谦《古文关键》以“关键”名书，与黄庭坚几度以“关键”论文，两者用语相同，语境相关，取义相近，也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

《古文关键》以“关键”作为书名，固然可以大致理解为门径、诀窍，也有将唐宋八家作为古文关键，将“意”与“立意”视为作文“关键”的意思。然而，就前一义来说，它还可以具体为“文法”。本书开卷第一篇《看古文要法》，共有“总论看文字法”、“看韩文法”、“看柳文法”、“看欧文法”、“看苏文法”、“看诸家文法”，以及“论作文法”、“论文字病”共八节构成，可见全书无非是“看文字法”与“作古文法”，由“看”而“作”，而归结于“法”，“古文关键”也就是“古文法”。当然，“总论看文字法”中第三目为“看纲目关键”，“看柳文法”中也特别拈出“关键”作为节目，可见“关键”还有更加细微的理解，即特指篇章的结构连接、起承转合。用吕祖谦的话来说，就是“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篇铺叙次第，是抑扬开合处”。这几层意思地位、所指各不相同，它们都与“法”相关，而落脚点则在结构与行文。编选者评点的重心也在这里。

作为一部评点本，《古文关键》的评点不免有个人的、随意的、欣赏的、感受的色彩，加上散文的法度探索也处在初始阶段，因此，要想对文中所揭示的文法做出简明的概括有一定困难。但大体来说，《古文关键》所论文法，还是可以分为体法、篇法和句法三个层次。

正如前述，还在魏晋南北朝时，论者已经发现和论述了文体有别，各有作法。刘勰《文心雕龙》的很多篇章都是有关文体体制和作法。作为一部古文写作指南，《古文关键》自然不会不注意到古文之内也有不同体制和作法。《总论看文字法》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学文须熟

^① 黄庭坚《答洪驹父书》。《黄庭坚全集》第2册（正集卷18），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74页。

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①，在具体的篇目评点中，也确实多有着眼于体式体法的评说。他的“体”指的是古文之中题材趋向风格相近的小体类，不同于一般所说文体，有时也称“格”或者“体格”。韩愈《谏臣论》篇文前评“此篇是箴规攻击体，是反题难文字之祖”^②，韩愈《答陈商书》篇文前评“设譬格”^③，柳宗元《捕蛇者说》篇文前评“感慨讥讽体”^④，柳宗元《与韩愈书论史事》篇文前评：“亦是攻击辨诘体，颇似退之《谏臣论》”^⑤，曾巩《救灾议》篇文前评“此一篇后面应得好。说利害体”^⑥，都是就体立论。当然，吕祖谦所总结的体格并不多，除了点出名目之外，也很少有更深入的论述，即使是名目本身，也没有最后定型，读者必须结合作品本身，才能领会它们的具体含义。

篇法也就是篇章结构、布局行文的法则。这是吕祖谦最为重视、用力也最多的地方，许多篇章中都留下了相关评点。其中，有关文章的起笔、收笔的评点特别醒目。韩愈《获麟解》篇首句评“起的好。先立此一句”^⑦，韩愈《师说》篇首句评“大意说两句起”^⑧，韩愈《原道》篇起首句评“散起”^⑨，苏轼《王者不治夷狄论》篇首句评“说大意，起头有力”^⑩，都是着眼于下笔，可见他对开门见山、先立大意的写法的激赏。柳宗元《桐叶封弟辨》篇文末评“结束委蛇曲折，有不尽意”^⑪，欧阳修《纵囚论》篇文末评“前不说尧、舜、三王，留在后结，词尽而意无穷”^⑫，欧阳修《春秋论》下篇文末评“缴结极好，移易不动，与

①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看古文要法”第1页。

②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3页。

③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18页。

④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32页。

⑤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33页。

⑥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117页。

⑦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1页。

⑧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2页。

⑨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6页。

⑩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92页。

⑪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24页。

⑫ 吕祖谦《古文关键》，浙江古籍出版社《吕祖谦全集》本，2008年，第39页。